

企鵝長篇小說叢書



荆歌
著

枪毙

Qiang
bi

枪毙

那個荒謬年代的荒謬的人和事，在那個年代裏，互相陷害，互相背叛。朋友背叛，兒子誣告老子，情懷。



枪毙

Qiang
bi

那個荒謬年代的荒謬的人和事。在那個年代裏，人人惶恐，互相陷害，互相叛賣。朋友背叛，兒子誣告老子，悖理的時候。

這是一部以家庭為法敘述「革命」年代眾生相的優秀小說。小說以「第一人称——我」的客觀敘述，從多個
 的人和事。在那個年代裏，人人惶恐，互相陷害，互相叛賣。朋友背叛，兒子誣告老子，悖理的時候。
 江處於花季年齡的少年本應該按着人
 等等不正常的性現象。小說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枪毙/荆歌著. 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
2001. 10

ISBN 7-5387-1591-6

I. 枪… II. 荆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0492 号

枪 毙

作 者: 荆 歌
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269 千字

印 张: 13
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号: ISBN 7-5387-1591-6/I·1525

价: 20.00 元

上 卷

第一章

父亲今天回家的脸色有些不对头。虽然，平日他的脸也总是阴沉沉的，眼圈黑黑的，但是，今天一定出了什么事情了，这是能从父亲的表情上看出来的。他的阴沉沉的脸上，带着几许惊慌。这在父亲来说，还是不多见的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差不多能够主宰一切，我们的欢乐、我们的痛苦，都像葵花籽一样装在父亲的衣兜里。他把欢乐摸出来，撒向我们，我们便欢乐；而若他摸出的是痛苦，我们便只得痛苦。我们的生活，乃至我们的心情，都牢牢地控制在父亲的手中。那么，他还怎么会惊慌呢？有什么事能让我们上帝般的父亲惊慌呢？不要说惊慌，就是快乐的表情，也很少登上父亲的瘦脸。就像这段日子来的天空，总是乌云密布，太阳仿佛消失了似的。太阳公公起得早，谁知道呢！由此可见，我们家的气氛，总是那样的压抑和阴郁。父亲不把欢乐的葵花籽从他的口袋里摸出来，屋子里当然就不会有欢乐的



芳香弥散。好在我们习惯了，就像这个漫长的雨季，我们已经习惯了铅灰的天空，习惯了嘀嘀嗒嗒的雨声，习惯了粘乎乎的感觉。我们早上从睡梦中醒来，根本就不期望天上挂着太阳。父亲的脸阴沉就让它去阴沉好了，那几乎就是它的本色，我们照样吃饭睡觉，照样上学去。我们并不奢望屋子里有芳香的欢乐荡漾开来。

但是，如果父亲的脸上不止是阴沉，那就有点麻烦了。在那阴沉的底色上，亮起愤怒的火，那就活该我们倒霉。什么事都可以成为打骂我们的理由，长久以来，我们认了。尤其是我，从未像哥哥那样有过反抗或者出逃的念头。对于父亲的打骂，我认作是生活的一种形式，就像人活着会生病一样。病在降临之前，并无什么明显的征兆，它来的理由也总是不那么充分。就像父亲的打骂一样。父亲要骂人了，要打人了，都只能是由着他高兴。好在他通常出手都并不是很重，他的巴掌在我后脑勺上拍击几下，或者抽我一个耳刮子，也就完事了。而他骂的，在我听来也都只是母亲，似乎跟我关系不大。由着他去好了，我经常对哥哥说，你总是对父亲的打骂表现出不服，甚至有反抗的意思，那么其结果只能是你挨双倍的打骂。那有什么好处？哥却有一次对我说，也许，他很快就要在这个家庭中消失了。当时我听了他这样的话，非常紧张，哥语焉不详，我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。可能性当然会是多种多样的，在这个家庭中消失，是出走，还是自杀呢？我没能从哥的口中掏出答案来。哥只是说，他或许很快就会从这个家庭中消失。或者，他又一次补充说，也许消失的会是父亲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感到更加惶恐不安

了。哥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莫非他要把父亲杀了不成？

日子在黑夜和白昼间穿行。家里没出任何事。哥哥没有出走也没有自杀，当然他也没把父亲给杀了。他只是在父亲的打骂前扬起他瘦小的手臂，以抵挡父亲巴掌的打击。他这样做，并没有能够护卫自己的身体，相反，父亲让哥哥反抗的手臂领受了棍棒的滋味。而我，从未觉得生活缺少了什么或者多出了什么。倒是父亲对母亲的打骂让我有些揪心。我挨父亲的打，完全只是肉体的事。而母亲的哭泣，却让我的心有了些不良的反应。现在还是不要说这些了吧，把话题回返到父亲的表情上。今天父亲回家，脸上有了些鲜见的惊慌之色，这让我感到有些不祥。

父亲说，北栅头出现了反标了！

父亲的眼光，并不对着我们。他既不看着母亲，也不看着我和哥哥，他只是盯着家里的一只鼓形凳看。不知道他这是在对谁说话，当然不会对凳子说，那就说明他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大家了，我们全体是父亲说话的对象。

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反标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是，它出现在我们北栅头，却似乎是头一次。它突然进入到我们生活的圈子里了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

反标上写的是什麼？母亲颤颤地问。

父亲以厌恶的目光扫了一眼母亲，说，你让我重复反标上的内容，你不是让我喊反动口号，让我当反革命么？

母亲不再出声。

哥哥却对父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他说，能不能介绍一

下反标写在哪一面墙上？是用粉笔写的，还是铅笔、钢笔？

父亲没有骂哥哥，那是因为哥的提问正切中他的思路。他正想继续介绍与反标有关的情况，他说，这条反标什么笔也没用。

我很奇怪，事实上也该轮到我提出问题了，三名听众中，只有我是唯一没提问过的人。我问父亲，那这反标难道是印刷在墙上的？

父亲肯定了我的猜想，他点点头说，差不多吧！

我们还是无法想象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反标。我们三人（母亲、哥哥和我）一齐在父亲面前摇头，我们表示我们不理解。我们像愚钝而认真的学生，除了摇头，不能再做别的。如果我们再提出什么问题，那么一定会招来父亲的叱骂。

最后父亲命令我们全体停止摇头，他决定把答案公之于众。他介绍说，这个反标十分狡猾；短短十二个字，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反革命分子从报纸上剪下了十二个字，拼成了一条最新的反标。他把这条像是印出来的反标贴在了我们北栅头！

接下来父亲的脸更阴沉了，甚至变得有些发白，他悔恨地说，我们家真不该订阅报纸的。我们家的《人民日报》已经订了整整十年。父亲说，要是这十年的报纸我们家一张不缺的话，我们就没事了。

我们全家，速速地啃了几个干馒头，喝了杯凉开水，就投入到整理报纸的繁重工作中去了。父亲作了分工，我和哥哥各负责查对两年的报纸，而他和母亲各查三年，这样一共

是十年，没错的。

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。那张1973年11月17日的报纸，非常明显地缺了一角。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纸角，由于这一残缺，不仅该日一篇重要的社论变得不再完整，同时刊登在社论左上侧的一幅照片，也只剩下三分之一了。问题是，这可是一幅伟大领袖的照片，而在这张报纸上，领袖的左臂和下肢不翼而飞了。我明显地感觉到，家里的空气在暗暗地发抖。你瞧，这张报纸，它像是昆虫的翅膀，无论在谁的手上，都不停地振颤着。当然它在父亲的手上抖得最厉害。父亲抖了一阵，向我投来了狐疑的眼光。他一边抖动着报纸，一边紧紧地盯着我。最后，他放下报纸，将我从桌前粗暴地推开了。我差一点摔倒。父亲可不管我摔没摔倒，他只是在我被推离座位后低头寻找起来。我这才明白，他一定是怀疑我在翻阅报纸时不慎把这要命的一角给撕掉了。他当然不会找到它。最后他一把拉住我的衣领，将我拖到他的面前，然后将我上上下下的衣袋都搜索了一遍。结果他的手指被一把刀片划破了。我就是这德性，喜欢在口袋里装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刀片也不例外。父亲的手急速地从我口袋里缩回来之后，他把他的手指放进了他的嘴里。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看得出来，在这样的时刻她不敢发问。她呆呆地看着父亲。

在反复追究了这个报纸角丢失的原因之后，父亲仰天祈祷，他说，但愿这个报纸角上的字，一个都没出现在反标上。父亲说，谢谢你了，老天爷！父亲的样子有点滑稽，我差一点笑出声来。

阿田的家在顾家弄里。顾家弄是我们北栅头最大的一条巷子，又暗又深。除了阿田家，还住了顾大安、迟阳等十来户人家。我最常去的是顾大安家，因为大安是我的同学。吸引我常去大安家的，是他家院子里所养的一只绿毛龟。乌龟怎么会长毛？这令我百思不解。顾大安告诉我说，绿毛龟是龟类中十分珍贵的品种，它的绿毛十年才长一寸。十年才长一寸，顾大安说，十年，人的头发该长多长？我说，这绿毛看上去不像是毛，倒像是青苔什么的，会不会就是青苔？大安听我这么说，显然有些生气，他说，青苔怎么不长到你的背上？大安这么说，显然是在骂人了，但我不生他的气，我说，能不能扯一根绿毛下来，让我回去研究研究？大安说，研究个屁！你敢动我家绿毛龟一根毛，我就杀了你！

这一次，我走进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顾家弄，经过顾大安的家而不入，我是专门去找阿田的。阿田家在顾家弄的最深处，阿田家住房很小，阿田住在一个阁楼上。每到夏天，阁楼上实在不能住人，要把我蒸熟了，阿田这么说。每到夏季，阿田就从阁楼上搬下来，睡在过道的地上。阿田在地上铺一张草席，据说十分凉快，尤其是裤裆里，钻进去凉凉的弄堂风，适意煞人！我去的时候，阿田正躺在草席上。我问阿田，凉快么？问他这话的时候，我看着他的裤裆。阿田却皱着眉头说，凉快倒是凉快，就是蚊子太多了。阿田家的蚊子确实多，我刚进门，就被叮了几口。不过我也顾不得痒了，我是来求阿田帮忙的。

我早就知道阿田家也订了一份《人民日报》。我对阿田

说，1973年11月17日的报纸能不能送给我？

阿田问，你要这报干什么？

我说，我们家缺了这天的报。

阿田说，给了你，我们家不就缺了么？

我后悔跟阿田说了实话，但说谎也来不及了。我于是苦着脸对阿田说，我们家这天的报被我撕破了，我爸要打我，他说要打死我。

在我们北栅头，我饱受父亲的打骂，那是尽人皆知的。谁都知道我和哥哥是被父亲打大的。许多人因此都非常同情我们，当我们脸上出现指痕的时候，人们会说，心肠怎么这么硬，打自家的小孩像打贼一样？阿田也一向同情我，他曾经给我出过主意，要我在挨打的时候赶快逃跑。可是我不敢逃跑，我对阿田说，要是我逃，那么回来就会被打死的。阿田听了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，那你干脆把你爸杀了算了，换了我，一定会杀了他！我苦笑了一下。阿田说，或者，你可以逃出去，永远别回来，比方说，逃到上海去，杭州去。阿田告诉我说，他的一个叔叔，就是因为小时候被他爷爷当众打了一顿屁股而一气逃到嘉兴去的，他从此没回来过，却在嘉兴开了粽子店。我对阿田说，我还是不敢逃走，倒是我哥哥，一直说不愿再做奴隶了。阿田说，还是你哥有骨气。

我知道阿田是同情我的，为了我不致挨父亲的打，他决定帮我。

阿田让我赤着脚，一起上他蒸笼一样的阁楼上去。这样脚步轻些，他不想让他的父母知道。阁楼上的热真是难以忍受，我们很快就全身是汗了。但我们都不在乎汗。阿田把他

们家一叠叠的报纸杂志都搬了出来，他们家的报纸杂志真多。我们翻了半天，终于把1973年的《人民日报》找到了。我兴奋得嗓子发痒，急急地翻了起来。我几次都差一点把阿田家的报纸翻破了。阿田警告我说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你要是撕破一张，你就别想把那张拿走！

一张张临近了，11月11日、12日、13日、14日……令人热血升涌。可是，真叫人难以置信，11月17日的报纸，竟然没有！

不会吧？阿田说。可是翻过来翻过去，就是没有。

阿田狐疑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的口袋。他怀疑我已经把报纸藏了起来。我哪有这么快的身手？我翻开自己瘪答答的开衫口袋给阿田看。

这就奇怪了，这就奇怪了！阿田连声称奇。而我的心，则又灰又凉。

最后我取走了阿田家的几本旧杂志。那是几本老《萌芽》，五十年代出的。把它捧回家，我读了一篇陆文夫的《小巷深处》。第二天我去问阿田，什么叫做“支女”？阿田说，什么“支女”，是“妓女”！妓女就是那样的女人，你给她钱，她就让你来一次。

顾家弄的边上，是一家酒厂。酒厂有一根铁管，凌空跨过小街，把废水引向河里。废水源源不断，在河里发出哗哗的声响。每次走到这儿，我都会想小便。我和卫川每次小便之后，都要跳起来摸那铁管。我们都太矮小了些，我们再使劲跳，也都触不到铁管。但我们相信，终有一天我们会摸到



它的。我们一天天在长高，同时我们的弹跳力也在一次次的跳跃中得到锻炼。

卫川有一天终于碰到铁管了，他作了很长距离的助跑，终于让自己的中指触到了铁管。它是热的！卫川兴奋地说。

看来我得好好努力了。

接下来，卫川每次跳之前，都在手指上沾些石灰，为了证明他确实碰到了铁管，他把石灰抹在了高高的铁管上。我无话可说。

每次被父亲关在门外过不了夜，我都是到卫川家住。卫川有个好妈妈。我总是叫卫川的母亲林老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她老师，好像也听不到别人这么叫她。事实上她也不像个老师，她从不上班，据说她身患数种慢性病，她病休在家。但我叫她林老师，她总是脆脆地答应。看样子她真是个好老师。每次我到卫川家过夜，林老师都表示欢迎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总是在翌日早晨下一碗面条给我吃。面条下得很好，宽汤，面条细白柔韧，其汤鲜美无比。葱花漂在面汤上，十分秀气。林老师还总在面里卧一个鸡蛋，她把我当作儿子来疼。第一次吃林老师下的面，我的眼泪都下来了。我忘了对她说谢谢，我只是坐在面条前哭。林老师叫我别哭，自己却也抹泪了。她说，吃吧，正长身体，瞧你瘦的！还说，以后再被你爸关在门外，就来我们家住，林老师再给你下鸡蛋面。

林老师说到做到，我究竟吃了她几碗鸡蛋面，已经记不清了。

晚上我就钻进卫川的被窝里睡。卫川有狐臭，那叫我难



以入眠。并且，他夜间还常常踢我，他睡得很不安稳。第二天早上我对卫川说，昨晚你踢了我三次，我三次都被你踢醒了。卫川就说对不起。我跟他说不关系，这不是他的错，他睡着了，踢人也不是他的错。

钻在卫川的被窝里，确实不是个滋味。卫川的被子一定有许多日子没洗了，它的齷齪是一望而知的。如果他的母亲林老师不是疾病缠身的话，我想她一定会替他将被子拆洗拆洗。我相信林老师一定没这个力气，她走路都是慢吞吞的，她从不轻易弯腰和转身，一切不必要的动作，哪怕再细小，林老师都不愿意去做。要洗卫川又黑又脏的被子，显然不是林老师力所能及。我好像听林老师说过，她活不了太久。她捏捏自己的鼻子对我说，说不定哪天她就死在了床上。听林老师这么说，我很伤感。我不希望林老师死，她是个好人。但我又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，我只是呆呆地看看林老师，我看到她终于笑了。林老师这样的身体，自然只能让卫川的被子脏去。对卫川的被子来说，脏似乎也算不得什么了，那气味才真正了得。我闻不得那味。如今回想起来，我都有些反胃。卫川的狐臭，夜复一夜把被子熏成了这付样子。我怎么钻得进去！但我无家可归，也只得强忍着钻了。我希望自己尽快睡着，可总是睡不太着。倒是卫川很多时候倒头便睡，他小小年纪就会打很响的呼噜了，他打着打着，就踢我一脚。



也有卫川睡不着觉的时候。他翻来覆去了一阵，忽然提议说，让我给他摸一把鸡巴。你不要小气，卫川说，你也可以摸我的。我说，这东西很脏的，摸它有什么乐趣？卫川

说，人家都说他包头皮，他想知道我的长得怎么样，是不是也是包头皮。我告诉他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包头皮。卫川就把被子掀开，先掏出他的东西给我看，他推了推他的包皮，说，你瞧，包皮这么长，当然只能是包头皮。接着他把我的裤衩脱了，他笑了起来，说，果然你也是包头皮么！他将我的东西捏了捏，说，我有本事将它捏硬起来的。我不让卫川捏，他就给我猜个谜，他说，不晒太阳，黑得出奇；没有骨头，硬得出奇。那是什么？我说这个谜也太简单了，不是你手上捏着的东西么？

卫川告诉我说，他爸的东西有问题。他说，他爸这么大了，还总尿床。因此他妈不跟他爸睡一床，他妈怕他爸把被子尿湿了没法睡觉。我不相信卫川的话，我说，我还从未听到过大人尿床的呢。

所以说我爸有问题么！卫川说。

除了狐臭，卫川是个讨人喜欢的人。他有一双巧手，他不仅会修理收音机，还能打制板凳和桌子。他透露过他长大了也许会成为一名木匠。我愿意跟他在一起。在北栅头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。反正在我尚未能够跳起来摸到酒厂的铁管时，我与卫川几乎形影不离。

因此我对卫川说，你听说了么，北栅头发现反标了？

卫川顿了一顿，问，你听谁说的？

我不想提到我父亲，就再问他，你到底听说了没有？

卫川说，我不知道出了反标，我只看见有人在观音桥头拍照。原来是拍反标啊！

卫川问我说，你知道反标上写了些什么么？

我说，我不知道。我就是知道，也不能对你说。我要是说了，不就是在喊反动口号了么？

卫川说，你就是喊了反动口号，我也不会说出去的。

我说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要真知道，就说给你听。

卫川说，要是知道反标上写了些什么就好了。

我说，知道了有什么好？

卫川说，我从来没见过一条反标，我想知道反标上都写些什么。

我说，把“万岁”换成“打倒”，就算反标了吧？

卫川说，那当然是反标了。但是，反标不会那么简单吧？

我不知道。

卫川拉我同去观音桥，卫川说，我们去看看，反标还在不在。

我们的镇子，由横竖两条直街垂直相交而成。如果从空中俯瞰，我们的镇子就是一个十字。十字的相交处，是人民桥，那是我们镇的繁华之所。观音桥以北，就是北栅头。我们亲爱的北栅头，一直从古老的观音桥延伸到窑港。窑港是个热闹的码头，成天可以看到人们蚂蚁一样往船上运砖运瓦。各种各样的船开来又开走。夜晚的窑港，则停泊着一些外来的船只，船上传来米饭的香、肉的香、酒的香、纸烟的香，和各种古怪的方言。泊在窑港内的，还有一些渔船。那是些小巧的，头儿尖尖的船儿。渔民们在船上捡螺蛳、挑蚬子、给虾笼鳊笼置饵。对于他们的鳊笼，我们有着特别的兴



趣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常有贪嘴的蛇会误入鳝笼里去。我们常常站在码头一带的岸上，看渔民清理他们的鳝笼。我们希望看到有蛇被捉出来。渔民们的脸很黑，嗓门很大，他们隔着好几条船招呼熟识的人。他们似乎有这样的习惯，他们对近在身边的人不理不睬，但他们对远远的船上的同行却表现出特别的热情。他们彼此大声地打着招呼，他们声若洪钟。有的渔船上还栖息着一些鱼鹰，它们有着口袋一样的下颌。它们栖息在小船的船舷上，懒懒地打盹。我就是不明白，这样呆滞庸懒的家伙，怎么能潜入水中将精灵似的鱼儿逮住？说实话我们对鱼鹰没有好感，它们一点都不英武。虽然从前我也曾同情过它们，它们有时候也确实是值得同情的，它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钻入水中逮鱼，而捉到的鱼却不能成为自己的美餐。它们只是为别人而劳苦着。而它们只能吃一点鱼的内脏。但是，渐渐地我就讨厌鱼鹰了，它们整天呆头呆脑的，最多只是动动口袋样的下颌。它们差不多像是死了。我知道迟阳也讨厌鱼鹰。难道不是这样么，迟阳不是有一次用汽枪射中了一只鱼鹰的眼睛么？不幸的是持枪的迟阳被一个渔民发现了，他大喊了一声，就跳到岸上来了。他几步就把迟阳抓到了，他在打迟阳的同时，还辱骂了迟阳的娘。他把迟阳打得不轻。这个长相像李逵的渔民，要是知道迟阳日后会成为一名警察，他还敢打他么？

渔船上的女人都有着宽大的胸脯，她们在渔船上洗衣做饭、擦洗船舷，她们的大乳随着手臂的动作而跳动着。阿田说过，渔船上的女人像是一艘艘肉船。

观音桥很快就到了，桥下却没有一个人。卖甘蔗的魁老

板也收摊了。反标会贴在哪里呢？是桥堍下酱油店的山墙上么？我们张望了半天，不见反标，只看到一则红色油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。字迹已经斑驳，但这语录我们却能倒背如流。那么，反标难道会在桥身上么？桥身上也没有。这座宋代的石拱桥，几乎被石缝里吐出来的枸杞的绿色枝条包裹了起来。有点像顾大安家的绿毛乌龟。要是反标贴在枸杞丛中，那么谁都不会看到。

卫川说，反标一定已经被揭掉了。

那么，它总该留下些痕迹吧？

什么都没有。也许，它根本就不是出现在观音桥下。

卫川忽然提出来，让我们也来写一条反标吧！

我很惊慌，仿佛反标已经写出来了。我摇摇头问卫川，你为什么要当反革命呢？

卫川说，我不要当反革命，我只是想写着玩玩。

我说，你要是写了，你就是反革命了。

卫川说，这儿就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不说，不会有人知道是我们写的。

我说我不写。我的理由是，如果我们写了，他们来查笔迹，就能查出是我们。

卫川说，我们不用写字，我们只要在这红色的语录上打几个×，不就行了么？

我突然有些发抖，我生怕自己耳朵一软，就听从了卫川的建议。我于是转身就要离开这里，我说，我要回家了，你要打×你一个人去打，不关我的事。

我走了几步，忽然想，卫川要是真打了×，那我也逃脱

